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

胡可先 孟国栋 武晓红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

胡可先 孟国栋 武晓红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 / 胡可先, 孟国栋, 武晓红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308-12918-3

I. ①考… II. ①胡…②孟…③武…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117 号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

胡可先

孟国栋

武晓红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415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918-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本书为以下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胡可先“唐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以新出石刻为依据的考察”，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10BZW029]。

孟国栋“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13YJC751038]。

武晓红“唐五代诗词与名物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3RWBS05]

浙江大学侨福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	1
一 唐代考古发现的类型	2
二 诗人碑志的发现与研究	12
三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背景考察	19
四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作品解读	25
五 考古发现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总体价值与局限	28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32
一 北朝文学研究的定位	33
二 文学主体研究的进展	41
三 文体形态研究的开拓	45
四 文学背景研究的深化	51
五 结 语	54
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	
——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	57
一 文学名家研究的视阈拓展	57
二 被埋没诗人诗作的重新发现	61
三 传记文学的特殊形态	63
四 文体研究的重要载体	64
五 著述活动的文学关联	66

六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述评	68
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	77
一 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价值与定位	77
二 唐代石刻文的整理刊布	79
三 唐代石刻文研究的现实困境	83
四 唐代石刻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86
五 唐代石刻文研究的推进思路	91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95
一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	95
二 墓志文体的成立条件	99
三 墓志文体的早期演进	106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	
——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研究中心	114
一 墓志铭创作的主要目的	115
二 志文和铭文的各自特点	118
三 志文和铭文的各自功用	123
四 志文和铭文的相互关系	126
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	133
一 二人合撰情况溯源	133
二 唐代墓志文中的合撰现象	136
三 其他应用文体中的二人合作	144
四 唐代二人合作撰文的时间分布	146
五 合撰原因初探	148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151
一 文学自传	151
二 文学家传	162
三 夫妻之间撰写的墓志	168
四 结 语	176
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	178
一 新出土墓志与卢纶家世	179
二 卢纶家族的任职历程	182
三 卢纶家族的婚姻情况	188
四 卢纶家族的文学成就	196
五 新出土卢纶家族墓志与卢纶边塞诗	201
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生活	204
一 隐逸的时间	205
二 隐逸的地点	208
三 隐逸期间的文学创作	210
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	217
一 家世探源	217
二 作品解读	222
三 书史实证	228
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	237
一 绘画史价值	237
二 书法史价值	243
三 文学史价值	246

四 墓志释文校订·····	251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256
一 名字与籍贯·····	258
二 科第与婚姻·····	261
三 仕历与经历·····	264
四 交游·····	266
五 墓志撰书者·····	269
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	272
一 《杨收墓志》志文笺证·····	273
二 《杨收墓志》与杨收的家世和身世·····	292
三 《杨收墓志》与杨收的学术和文学·····	307
四 《杨收墓志》撰者裴坦的考察·····	317
武则天君臣石淙唱和诗碑考论·····	324
一 石淙诗碑的著录与考订·····	325
二 石淙唱和诗的道教内涵·····	331
三 则天金简与石淙诗文·····	340
四 石淙唱和与七律演化·····	345
五 薛曜与石淙诗碑书法·····	351
论石门题刻的文学内涵和价值·····	355
一 引言:石门题刻的文学内涵和意义·····	355
二 石门题刻的文体类型·····	356
三 石门题刻的纪实性·····	362
四 石门题刻的艺术性·····	367
五 结 语·····	374

“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	376
一 唐五代诗词中的“蹙金”	376
二 “蹙金”的文献梳理	378
三 “蹙金”实物及其宗教意涵	380
四 “蹙金”与“盘金”、“缕金”、“贴金”	385
五 结 语	390
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	392
一 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的类别划分	392
二 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声色表现	407
三 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意象组合与传递	415
四 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情感寄托	423
五 结 语	428
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	430
一 服饰之属：绣罗、蹙金、钿叶、腰褭	430
二 宴饮之属：犀箸、翠釜、水精盘、鸾刀、八珍	439
三 装饰之属：云幕、锦茵	447
主要参考书目	451
索 引	465
后 记	468

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都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王国维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②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③张广达在唐史研究趋向的考察方面曾这样说:“对于隋唐史而言,未来发现新材料至关重要。史料从来是多多益善,不患寡而患不足征。……文书文物资料的不断发现,不仅将从物质文化方面,而且也将从精神文化方面为深入研究隋唐历史,或者说研究中国中古史开辟灿烂的远景。”^④因此,新材料的发现,无疑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更是文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无论是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按,本书注释为简明起见,于作者、编者的标注省去“著”“编著”“主编”“校注”字样,对于一人领衔众人合撰之书,仅按版权页标注而省去“等”字,如《旧唐书》标注“[后晋]刘昫”,《新唐书》标注“[宋]欧阳修、宋祁”。

②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5页。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第5页。

④ 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中国学术》第八辑(2001年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9—297页。

在新材料的发现当中,考古发现最为重要,因为考古发现的材料是埋藏于地下的保存了当时风貌的原始材料。这对于唐代文学研究,更显得意义重大,因为就中国书写文献的发展来说,汉代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时代。在汉代以前,因为时代的久远和书写方式的艰难,给文学的独立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尽管20世纪出土的简帛文书颇为丰富,但其重点是落在学术史而不是文学史研究方面;宋代以后因为书刊印刷的盛兴,大量的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因而考古资料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利用价值相对而言就大为减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是抄本文献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尤其是唐代,是纸抄文献流传最多的时代,由于抄本文献辗转易误,以及流传中容易散佚的特点,利用新的考古发现的材料以进行唐代文学的研究,对于探索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文学史现象,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唐代考古发现的类型

(一)石刻文献

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而言,石刻文献尤其是碑志,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碑指神道碑,志指墓志铭,二者相较,墓志铭又比神道碑的数量多得多。因为墓志铭埋藏在墓穴之中,保存于地下,往往千年完好,而神道碑则矗立于墓道之前,经过数百年风雨泐蚀,战争水火,则磨灭殆尽。考古发现的石刻文献,经过整理和汇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石,二是拓片,三是释文。因为条件的关系,我们从事唐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利用拓片和释文,而原石往往大多不易见到,有些仅有拓片而失去了原石。对于拓片和释文的整理之作,是我们最应该利用也最便于利用的重要文献。

考古发现的唐代新文献,尤其是石刻文献中的碑志,20世纪就已经

呈现出繁盛的局面。早在 20 世纪之初的清朝末年,修筑陇海铁路时,取道邙山脚下,因而掘出不少墓志。经过张钊(字伯英)的收集,保存于“千唐志斋”。后来经过整理,出版了《千唐志斋藏志》^①。20 世纪早期,罗振玉等学者亦着力搜集唐代墓志,并加以著录,成《芒洛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等,李根源有《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为研究唐代文史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20 世纪的后半期,更有关于唐代墓志集中整理的书籍多种,如《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等。进入 21 世纪,随着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版印刷更加便利,有关唐代石刻文献的汇集与整理也超迈前贤,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并表现出突出的特点:断代墓志和地域墓志的专门汇集。

1. 断代墓志的专门汇集

专门汇集唐代墓志的著作,最为集中者是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这两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重在录文,不收拓片,按年代先后排列,并进行全面整理、标点,每篇墓志之后,标明原石或拓片来源,书后附有人名索引,确为嘉惠士林、沾溉后学之举。自出版以后,一直成为唐代文史研究者的必备之书。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因为该书卷帙浩繁,又不附拓片,故使用时需与另一部仅影印拓本而不附录文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对照。《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以原拓片影印,保持了原貌,天津古籍出版社于 1991 年出版。该书共收拓片五千余种,按收藏地分《洛阳卷》、《河南卷》、《陕西卷》、《北京卷》(附《辽宁卷》)、《北京大学卷》、《河北卷》、《山西卷》、《江苏山东卷》、《新疆卷》共九卷三十册。每篇墓志之下,对其出土时间、出土地点、撰者书者、收藏情况都有所介绍,部分墓志志名题署等残缺之处还有所考辨补充。《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出版,则是汇录金石著录成果和方志中金石志所载隋唐五代石刻文献的著作。此外还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藏志》,本来是张钊搜集,嵌置在窑洞墙壁之上墓志,后来经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整理编纂成《千唐志斋藏志》一书,由文物出版社 1984 年按原状影印出版,颇便于利用。

有袁道俊编著的《唐代墓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施蛰存编著的《唐碑百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赵君平、赵文成编著的《新出唐墓志百种》，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 年出版。此外，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紫禁城出版社 2010 年出版，此书所收墓志虽多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征集所得，然亦间有此前诸书所未收录的唐代墓志。

2. 地域墓志的专门汇集

墓志的出土都是具有特定地点的，各地出土的墓志集中收藏起来，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这在墓志的整理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近年来搜集整理墓志规模甚大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就是按照地域的分布而分册出版的。现在已经出版了《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文物出版社 2002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及陕西卷贰，文物出版社 2000 年、2003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文物出版社 2003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文物出版社 2003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卷壹常熟）》，文物出版社 2006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 1994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贰）》，文物出版社 2002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叁千唐志斋壹）》，文物出版社 2008 年。此外，还有《偃师碑志精选》，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年，则专录偃师一地的墓志。而在地域墓志的整理和出版中，以洛阳和西安最为集中。

新出土碑志以洛阳为最多，故专收洛阳碑志的书籍甚多，除了少部分为上一世纪已经整理外，大多数是新世纪十年中问世的。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 1996 年；《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 2008 年；《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洛阳名碑集释》，朝华出版社 2003 年等。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 1994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贰）》，文物出版社 2002 年，《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叁千唐志斋壹）》，文物出版社 2008 年；《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 2004 年；《偃师碑志精选》，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年；《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 2007 年;《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 2011 年,亦收洛阳墓志碑刻颇多。这些碑志的整理著作,虽多各朝兼收,但每一部著作中,几乎一无例外的是以唐代墓志占绝大部分。如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齐运通编著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共收录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新出土墓志 400 余方,而且所收墓志均为近年出土,首次正式发表。其中唐代墓志即有 315 方,占全书比重的 79%。同时在影印拓片之后加以简要的考释,对于唐代文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齐渊编著《洛阳新见墓志》,共收新出墓志 40 方,其中有唐代墓志 16 种,用宣纸原大影印盒装,贴近墓志的原貌。此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还出版了《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朝华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了《洛阳新出土墓志目录》。

新出土碑志以西安为中心者也甚为集中,近年出版者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 2007 年版;《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与西安相关陕西出土的碑志已出版者还有《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澄城碑石》,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户县碑刻》,三秦出版社 2005 年版;《临潼碑石》,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此外在上一世纪末期出版者还有《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5 年版;《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1 年版;《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3 年版;《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5 年版;《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6 年版;《潼关碑石》,三秦出版社 1999 年版;陕西省图书馆《馆藏陕西碑石拓片选》,三秦出版社 1999 年版;这些汇录的书籍,唐代碑志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至如《昭陵碑石》则都是唐代的作品。

新世纪出版的有关唐代墓志的汇集之作,往往更加注重拓片的影印和释文的对照。诸如《邕洛碑志三百种》、《河洛墓刻拾零》,都是影印碑志的拓片;《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都是影印拓片和释文校点并重的,前者每种拓片后即附有释文,而后者则是前半集中影印拓片,后半则附录释文。至于《新中国出土墓志》则每卷都分

上下册,上册为影印拓片,下册为校录释文,拓片与释文之间的对照更是非常明显。《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则将拓片、释文和研究进一步融合在一起,为新出土墓志的整理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当然,石刻文献除了碑志之外,还有一些造像记和题名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唐代文学的研究,但这些数量毕竟较少,我们就略而不论了。

(二)写本文献

写本是纸张发明以后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尤其在简帛文献之后,印刷术发明之前,写本时代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时代。因此唐代是印刷术流行之前写本最多的时代。出土文献中的唐代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为多。敦煌写本的出现是在20世纪的初期,而且逐渐形成全世界的显学,故而其整理的情况在上一世纪已经相当完善,新世纪的成就主要以专题研究为多。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较迟于敦煌文献,故在新世纪出现了很多新的成果。虽然较敦煌文献而言,新出土的吐鲁番文献唐代文学的比重不多,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里出土的文学文献,不仅是文学本身的问题,更涉及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问题。

集中整理吐鲁番文献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上一世纪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该书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释文本,后又出版图文本,1992年至1996年出齐。一部是新世纪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该书由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这两部著作是唐代文史研究者无法绕行的最为原始的文献材料。我们以后者为重点谈谈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吐鲁番新出土的文献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民风世俗得以凭借的最为原始的材料。如其中所载的写本“古诗习字残片”(该书第356页),反映出唐代吐鲁番地区以诗歌作为启蒙教育载体的教育方式。再如其中所载的多篇家书是研究唐代西域书信文体沿革的重要资

料,最典型的是《洪弈家书》(该书第16页),是开元七年的写本,记载洪弈在西州于五月一日发向北庭的行程,描述了其时交通阻隔的情况,也书写了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些不仅本身具有抒情意义和文体价值,同时对于研究唐代边塞诗人的行军路线,以及边塞诗所表现的地理环境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出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不少唐代类书的残片,这些写本残片不少是佚失的类书片断,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学术与文学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还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文献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当地学生所写的《千字文》,同时也发现了更早的高昌时期的《急就篇》写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习字文本的演变。还有一件学生习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和一首佚诗,颇为难得。……出土文献还包括一些书信残片,但有一件开元七年的《洪弈家书》,却有幸完整地保存下来。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这批新出土的丧葬文书中,首次发现了明确标作‘移文’的文书,证明了随葬衣物疏向移文的转变,这对于今后我们判定许多衣物疏的性质和名称,提供了坚实的证据。”^①

(三)实物图像

文学研究离不开实证,实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物印证,利用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虽然在上一世纪初期王国维先生就提出过“二重证据法”,但在上一世纪利用实物以印证文学作品的成果并不多见。随着出土文献种类的增多,和图像印刷水平的提高以及图像书籍的丰富,这一领域不断会被开拓。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唐墓壁画中的很多图案以印证唐诗当中表现的妆饰服饰,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升仙图以对照研究唐代的游仙诗,也可以利用特定的壁画以研究唐人的各种信仰和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如节愍太子墓壁画的《升仙图》利用王子晋的传说故事,演变成墓中壁画。我们以此图与《升仙太子碑》比照研究,可以进一步理解碑文与政治事件以及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一传说故事经过武则天的刻意经营,

^①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页。

成为存在于政治活动中的现实事件,也成为当时政治群体人物撰文、作画的重要题材^①。因而像这样的实物证据,实则是集政治、宗教、文学与艺术于一体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广泛利用新出土实物以及相关的图像影印文本以研究唐代文学,就是一条值得进一步开辟的方向。这里选择两种集中整理过的实物事例加以说明。

唐墓壁画 集中整理唐墓壁画的图录本有文物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昭陵唐墓壁画》,“从题材上看,多为现实生活的写照;从风格上看,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用笔上,或奔放泼辣,或遒劲朴实;在用色上,或简洁明快,或细腻精到。人物无不形神兼得,栩栩如生,堪称唐墓壁画的上乘。”^②有三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神韵与辉煌——唐墓壁画卷》,通过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壁画文物精品选择精印而成,图文并茂,集资料性、学术性与观赏性为一体。还有文物出版社 1974 年出版的《唐李贤墓壁画》、《唐李贤墓李重润墓壁画》,2002 年出版的《章怀太子墓壁画》、《懿德太子墓壁画》、《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画》,重庆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三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唐墓壁画珍品》等。《章怀太子墓壁画》,是唐代壁画的珍品集,因为章怀太子墓壁画是已发掘的唐墓中保存最为完好、内容也最为丰富的壁画墓葬。“这些精美的壁画又向人们展示了唐代画师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将近一千三百年前中国已高度发展的绘画艺术水平。其墓道东壁绘制的《狩猎出行图》,高 2.4 米以上,全长 12 米,是一幅气象壮观的巨幅精品。其上绘有五十多组鞍马人物,架鹰牵犬、束腰配箭、装备齐全地奔驰行进在林木繁茂的山道中。其中前五骑为先导,其后是一位身着灰蓝袍服、气态昂然的首领人物率领几十骑人马前呼后拥地行进,整幅画面采用了俯瞰式全景描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动感。同时,画面上表现唐代皇室贵族游猎出行场面,

① 参王静:《节愍太子墓升仙太子图考——兼论薛稷画鹤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第 110—118 页。

② 昭陵博物馆:《昭陵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 页。